

編 者 的 話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五星紅旗下长大的，沒有象老一辈那样受过封建地主和反动统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压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压迫者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对旧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缺乏深切的体验，更缺少阶级斗争的锻炼。为了使广大青年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和革命的传统教育，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用老一辈的痛苦经历和阶级斗争的史实去教育他们。我们准备陆续汇编这类小册子，供大家阅读。

收集在这本《不要忘记过去》里的七篇家史，都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血和泪的回忆，是揭露旧社会罪恶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能够帮助我们提高阶级觉悟，提高革命警惕，激发革命斗志，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家谱一代一代传下去，做到永不忘本、坚持革命到底，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絲釘。

本书中的有些文章，是在某些报刊或出版物中发表过的，因为质量较好而且又是本省的事情，所以收集出版了。这些文章，在出版前，我们又作了一些改动，特声明一下。

一九六四年三月

目 录

李丕忠家史·····	李丕忠 (1)
卖身文契·····	李煥清 (12)
四亩二分地·····	何瑞泉 (23)
紡織女工話今昔·····	任本香 (32)
我的腦是怎样拐的·····	史志祥 (39)
苦水倒不尽 幸福說不完·····	樊久亭 (48)
人間地獄變天堂·····	周道明 (55)

李丕忠家史

李丕忠

林儿：

人上了年纪，总爱思前虑后的，退休以后，我常常思想咱家的情况。我从你爷爷手里继承下来的，只有一条世代相传揽工、卖豆腐用的扁担。从一条揽工扁担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中间曾经经历过多少苦难、多少风险，流过多少血汗啊！今天的幸福生活，这全是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争来的。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深如海。咱们是世世代代都要记住，都不能忘记的。

在空闲里，我把咱的家史整理成一个文字的东西。看看这份家史，你们就能够了解咱家是怎样在苦水里生活的，咱家是怎样翻的身。我常好对你们说，不能忘本，这就是咱家的根本。你们一定要把这本家史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让后代们也知道他们的祖先的根本，使他们也永不忘本。

祖祖辈辈受剥削 揽工扁担代代传

咱的老家，原在临县宫地村。据老人们传说，在我的高

祖父手里时，因为在本村揽不下工，租不下地，被迫迁移到临县槐树墩村。当年的详细情况已无法考查，但在迁移老祖坟时发现，祖先墓内不见半点腐朽棺木的痕迹，只见枯骨头枕炭块，身铺荞麦秸，贫困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你们的曾祖父，喂猪、卖豆腐，苦了一辈子，穷了一辈子，活到八十四岁，临死也没有赚下一床铺盖。你娘娘（编者注：祖母）从你老外婆家拿回几块破毡片，缝缝纳纳，给你们曾祖父补上，这算尽了很大努力，对老人的一点点孝敬。

你爷爷李应文老兄弟四人，都是靠揽工、半种地（编者注：租地的一种形式），喂猪、做豆腐过活，到老来，几乎都是被贫困病饿折磨死的。

我们兄弟四人，从你爷爷手里接过来的，就是那么一条从你曾祖父手里传下来的揽工、卖豆腐用的扁担。

动荡流离老人外出去揽工 飢寒交迫忍痛出卖亲生子

黄连苦连心苦，苦不过穷人苦中苦。咱家本来就穷就苦，光绪二十六年又遇上了大灾荒年，穷上加穷，苦上加苦。你娘娘说，她一连四十天没见一颗粮食，尽吃野草野菜。肚皮饿得象纸一样薄，吃蒲公英吃得指甲都成了绿的了。你爷爷出外揽工，地主只管吃，不给工钱。那年月是怎样熬过来的啊！

一九〇七年（那年我四岁），咱家在槐树墩村实在活不

下去了，你爷爷把我和你二叔一担子担上到处飘流起来。先到梁坡底，给富农高金保当长工。当长工养不了家，你爷爷就把你娘娘、我和你二叔寄养在你老外婆家。老外婆家同样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转年你爷爷又把我们担到尧昌里，寻了间破窑，买了口水缸，借了盏油灯，弄来些糠粃菜菜，把我们母子三人临时安顿在尧昌里，他又出外揽长工、打短工去了。

揽工养活不了家口，你爷爷又回到尧昌里，给富农毛老虎半种地。原想，这尧昌里“九颗疙瘩十八道塌”，尽是好地，怎样还混不下碗饭吃？谁想，你爷爷给人家干了三年，又被人家赶出来了，说他背锅（编者注：驼背），干活不利爽。你爷爷原来身体多结实，硬是给地主受苦受得闹下毛病。无奈何，你爷爷只好再外出流荡揽工。

一九一五年，我刚满十二岁。小小年纪就给麻捣地主曹侯狗家当了羊倌。山里狼多，一天碰上了狼，狼叼走了一只羊，我吓得浑身发抖。可是地主却指着我的鼻子大骂。“狼就没有把你吃了！给我滚蛋！”连羊倌也不叫咱当了。

羊倌当不成，可日子还得过呀！我就和你二叔到处跑着揽杂活干。谁家娶媳妇，我们就去给人家拉驴。人们说，拉驴是最下贱的事，咱那能顾上这些呢？谁家办婚丧大事，我们就去讨口“喜食”吃。谁家盖房子，我们就揽点小工子活，给人家提提泥包送送水。你爷爷常常念叨：“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给孩子们寻下个脱嘴处啊！”

“拐腿牛怕滑，穷人家怕灾。”一九一九年，大旱，半种地分的粮还不够还债。秋收刚完，家里就没吃的了。你爷爷

看家中呆不住，闪过年就带上你二叔和三叔走了石楼。我到梁家坡给富农高金保当了长工。

家里还有你娘娘和你小四叔，他们的生活仍然没着落，



怎么办？你老舅出主意叫把你小四叔卖了。你娘娘痛哭流涕，亲生骨肉心连心，怎舍得卖呀！你老舅难过地说：“孩子卖了，跟上人家也许能逃条活命，留在家里奔叫往死饿呀！”你娘娘泪湿衣襟，忍

痛割心，把你小四叔卖了。你小四叔卖了二十四吊钱，算救了你娘娘一条活命。

受苦受辱尧昌里 如牛似马十二春

一九二四年，我二十一岁，你二叔丕孝十九岁，三叔丕

古十七岁，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弟兄们怕你六十五岁的爷爷流落在外，就把老人从石楼接回尧昌里。这样，一家人才算定居下来。

在尧昌里定居以后，咱家给地主“五阎王”薛永太当了地伙计（佃户），半种了他家一百一十亩地。半种地的规矩是：一切工本底垫都是地伙计的，打下粮食却是和地主对半分。有三分奈何的人家，是不给地主当地伙计的。可是我们想，凭着兄弟三人的劳力，怎样还养活不了双亲和一个小妹妹？我对你爷爷说：“爹，你放心吧，有我们弟兄三个，再也不让你老人家受饿了。”

可是，旧社会哪有穷人如愿的事！老人们说：“揽工半种地，终久一肚气。”这话真是有血又有泪的。半种地的头一年，咱没有底垫，春天吃的粮要向地主借，种子要向地主借，牲口饲料要向地主借。这一年，偏偏又遇上了旱灾。秋后，五阎王的算盘子儿一拨拉，除了他的，咱们啥也没分下。没有吃的，只好再向五阎王借粮，五阎王不但不借，反而怒冲冲地说：“好容易，要借，先把以前借的全还清！”全家六张嘴都得要吃要喝啊！东求西借凑了两吊钱，买下一担粗糠、五升黑豆，暂时糊口。冬天，我和你二叔、三叔弟兄三个，风里雪里，起早搭黑，担磁卖炭，苦熬苦受，才算没有饿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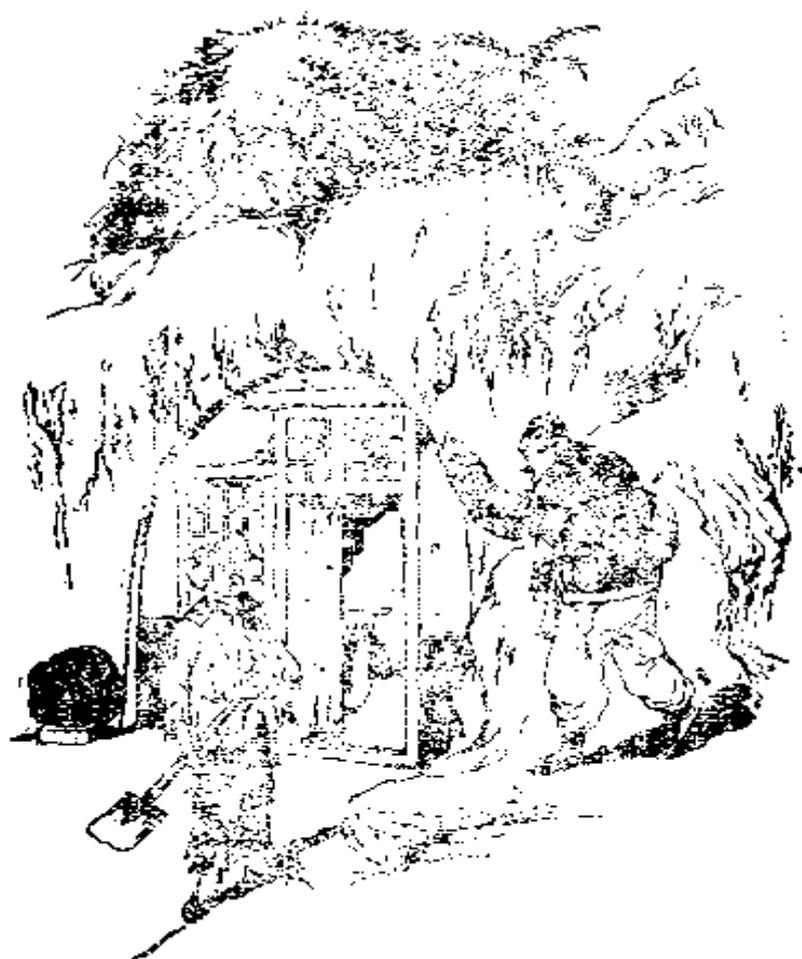
当了地主家的地伙计，那就成了套在地主车上的牛马。地主不光是通过地租盘剥地伙计，而且还放高利贷。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二斗，加上小斗出大斗进，实际上秋后得还二斗

四。这还不算，地伙计还得无偿地给地主家服杂役。地主家一年三百六十天吃的水，全由地伙计给送。咱给五间王家挑水，早晨去得早了，人家还没起，下午去得迟了，人家门关了，咱说：“挑来水了，开开门吧。”人家说：“你担动水，我开不动门。”咱心想，不开门就把水放在门口，你起来还不能提进去往缸里倒一倒，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管，水原封原地放在那里，还得咱给倒。至于“临时帮忙”，那就更不用说了，秋里谁家活计不忙，可是不管你手头活计多紧多忙，只要地主家一声唤，就得赶快放下自己的活计去“帮忙”。

旧社会，地富坏蛋横行霸道，真像是天地都是他们的。穷人屙屎也得先看看地方。有一次打麦碾场时，不小心牛屙到薛法柱场院里一堆粪，他就破口大骂：“龟孙们，为什么不把牛粪供献在你家神祖前！”硬要把咱家麦子往灰渣堆上倒。咱好说歹说都不行，最后你爷爷出面求情、送礼，才算了结。又一次，咱家把扫院的一堆髒土倒在村里灰渣坡上。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灰渣坡就是倒髒土的地方嘛。可是，不知怎样就惹下乡绅薛明山，他指着我的鼻子骂：“天是我们薛家的天，地是我们薛家的地，那有你们外家百姓龟孙子们倒土的地方！”立逼我把土收起来，送到村外头去。

可能是一九三六年秋天，打完场，咱家把豆秸放在了窑顶上。五间王一见就骂：“龟孙子们把豆秸放在这里，让老鼠掀塌我的窑顶怎么办！”我和你叔叔们赶紧把豆秸搬到院外墙角边，五间王一见又骂：“这是放豆秸的地方，

老鼠挖开洞，水冲塌我的窑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又把豆秸搬到离窑很远的一堆烂土上，你猜五阎王说啥？他说：“放在那里，脏了我的土怎么办！”我心里真气极了，可是又得忍气吞声。我问：“你看放在那里，请指点指点。”五阎王威风抖够了，把脸一仰说，担到街圪塔上去。



咱家在尧昌里过了十二年，受苦受辱的事情，那是说不完的啊！

干革命腰杆越来越硬 恨入骨地富阴谋陷害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干部来到了尧昌里。他们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他们遇事总是

我穷人们商量。我心里暗暗想：“世界上真还有这样好的人！”后来，村里成立了牺盟会。财主们说那是“坏人会”。我可觉得是好人会，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

参加牺盟会以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叫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以便评合理负担。村副薛兴本（地主）对牺盟会的下乡干部说：“尧昌里中中常常，应评为二等。”我对他们说：“尧昌里二十几家富户，占着一千多亩好地，在磺口还闹着几家大买卖，有粮有钱，应评为头等。”牺盟会的干部听了我的意见，又做了些调查研究，把尧昌里评成了甲等。

这一下，真是一棍子通了马蜂窝，村里的地富纠集起来，煽动人要开斗争会整我。恶霸薛正兴叫嚷，非把李丕忠那龟孙子剥得吃了人肉饺子不行！旧村长张元功怕牺盟会的干部说他不进步，不爱国，出来劝阻，才算暂时平了这场风波。我心里想，有牺盟会给我撑腰，怕你们什么。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秘密地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打这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觉得自己腰杆子越来越硬，工作也就更积极起来了。可是，咱越是腰杆子硬，越是工作积极，地富坏蛋们越是恨之入骨，越要想办法“治”咱。平常找咱岔、打麻烦就不用说了。他们千方百计想着夺咱家的饭碗，杀我的头。先是五闫王要抽地。要搁在以前，咱就得求情哀告了。这一回就顶了他，我说：“半种地也得有个规矩，等秋收了再说。”地主就是这种骨头，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你怎样。后来閻錫山的顽固军要兵，我和你叔叔们本来都不在出兵的范围（我和你二叔过了年龄，你三

叔残废），但是村里的地富坏蛋们一商量，硬把兵派在咱家名下。他们把你三叔给弄了去，顽固军检查不合格，又给退了回来。这一办法不灵，又想别的计谋，硬说咱家侵占了社地（村里的公产）。地主富农来了一大堆，又是丈量又是盘算，这个说这里有村里的一棵树，怎么不见了，那个说，窑顶上是社地，就是侵占公产。最后他们一致决议，叫咱家重写一张地契，另罚咱家雇一个兵，并出二百八十块白洋的罚款。

过了几天，形势紧张起来。村里的闾匪敌工团正副团长——地主薛华实和薛泽蕃召集一些地主富农开会说：“临县城已经杀开牺盟会了，咱们也动手吧，先把李丕忠收拾了再说。”幸亏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我，我赶快把隐蔽在咱家的一个同志送走，自己也连夜逃走了。

打倒敌人建立新政权 反动阶级阴魂不散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九四〇年间从西北来了咱们的队伍——八路军。八路军就象秋风扫落叶，没几天就把顽固军打跑了。晋西北各地普遍建立了人民抗日民主新政权。我回村后不久，担任了村农会的秘书。新政权一建立，地主恶霸着了慌。他们托上人找我说情。我想，阶级仇深似海，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不是我李丕忠一个人的事情。接着我们就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发动减租减息运动，组织民兵武装。经过这一连串的活动和斗争，打倒了恶霸薛兴丑，煞了地主富农们的威风。许多贫雇农逐渐有了些土地，

咱家也有了些土地。这是咱家祖祖辈辈梦想不到的事情啊！

穷人翻身，地主富农是不甘心的。他们表面上老老实实，背地里仍然兴风作浪。当时，尧昌里只有三个党员。地主和反动分子的矛头首先对中了我们三家。有一次党员薛占英同志出外参战，家里人对地主反动分子防范不严，他家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被敌人喂毒暗杀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由于党的需要，我离开家到外面工作了。我虽然离开了家，但是地主反动分子却忘不了我。他们又一次想乘党的干部整风的机会，煽动群众把我打倒。但是由于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四六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经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尧昌里的封建地主被彻底打垮了。薛华实畏罪逃跑；薛泽蕃罪恶重，被政府判处无期徒刑，五阎王等也被彻底斗倒。尧昌里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翻了身当了主人。咱家在上改中也和其它穷哥们一样分到了土地、耕畜、房屋……。随着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咱家的生活也越过越好。现在的生活，你们都看到了，住的有窑有房，铺的盖的有毡有毯有被有褥，使的用的有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你们都念了书，有了文化。这和从前比起来，真是天地之别啊！

× × ×

咱家的家史，我就写到这里，你和你姐姐都已长大成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你们将怎样续写咱的家史，那就看你们的作为了。你们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

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党走，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献给党的事业，把咱的家史续写得更红更红。

父 李丕忠

一九六三年一月

(刘 沙插图)

卖身文契

李 焕 清

一 张 卖 身 契

我从入伍那天起，在军人登记表上一直这样写着：韩文清，山西省沁县人……。

其实我知道沁县并不是我的故乡，我也不姓韩。但是，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生身父母在什么地方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象一堆解不开的疙瘩，一直在我心中悬挂了三十多年。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意外地接到沁县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啊！原来是我的卖身契！它是用朱砂红纸写成的，因为年代过久，红色已经变成了猪肝色。卖身契上的墨迹清清楚楚，就连上面盖的两颗方形印章也清晰可辨，一颗是“山西沁县乔村村长图印”，一颗是“山西沁县乔村村副图印”。我拿着这个旧社会吃人的罪证，不由得急促地默念起来：

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系直隶代（大）明府原城县西河在（寨），年遭荒旱，衣食所迫，难以度日，无奈将自己本身名教（叫）小二情愿卖与韩兴盛名下作

子，以承宗主嗣后，同人說合得过大洋五十元整，其洋笔下交清，两出情愿，并无返悔。日后倘有人找信，有卖（人）契作証；口說不（无）凭，立卖人契为証。民国拾捌年二月二十六日

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手印）

同公証人乔村村长、村副（图印）

同說合人王炳、王丙和、王阳、田存盛（划押）

我读完这张卖身契，心里充滿了怨憤。这里提到的人，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韩兴盛是我的养父，他是一个穷苦的老人，已去世三十年了。王丙和是乔村的土豪劣绅。王阳是乔村的恶霸地主。其他我都不知道。尤其是张文善这个人，他是什么人？怎样卖我的？我的身世又是怎样的？对我说来还是个謎。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去北京开会时，组织上批准我去找家，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我那受尽苦难的生身父亲，看见了哥哥、姐姐。通过父亲、哥哥、姐姐的叙述和我个人的回忆，这才把我悬挂在心中三十多年的疙瘩解开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的故乡是河南省清丰县城南五里的李家庄。我的生身父亲叫李金魁，在我被人拉走抵债时，家中除父亲外，还有母亲、哥哥、姐姐，大小共五口人。父亲是个勤劳的木匠，有一手好手艺；母亲是个纺纱的家庭妇女，从我记事起，她

沒有离开过纺纱车。可是，尽管他们沒日沒夜地辛勤劳动，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仍然无力养活自己的孩子。我姐姐几岁时就当了我的养媳，我从五岁起就同哥哥一块开始了乞讨生活，每天跑到县城去捡西瓜皮、烂白菜叶，乞讨大户人家的一口洗锅水来维持生活。

记得在一个严冬风雪交加的早晨，母亲叫醒了蜷缩在一起的我和哥哥，爱怜地对我们说：“好孩子，起来吧，进城要点东西吃！”

我和哥哥望着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窗外旷野，谁也不吭声。母亲看着骨瘦如柴的我和哥哥，立刻起了一种怜悯心，她不忍得再叫我们起来了。可是，她沉默了一会，看着冷冰冰的锅，又看看我们，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再次对我们说：“好孩子，起来吧，去城内要点东西吃吧！妈给你们穿上衣裳！”

哥哥是懂事的，知道母亲的难处，他一骨碌爬起来并把我拉起来。我们穿上破烂棉袄，朝着县城走去。我们好几天都要不着东西，象这样的风雪天又向谁家去要呢？我和哥哥冒着风雪跑了大半个城，什么也要不着。为了争一点人家扔到臭水沟的烂白菜叶，我们还和一些穷孩子打了一架。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全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父亲眼看全家无法活下去了，就背起木匠工具含着眼泪对母亲说：“孩子的娘，你在家好好拉扯着孩子，我出去挣点钱，好叫孩子们吃顿饱饭。”

从此，父亲就离开了家乡。

抵 債

父亲走后，我们娘儿几个靠着母亲的一架纺线车和我们哥儿俩偶尔乞讨来的残湯剩饭，过着最艰难的日子，日夜盼望着父亲能够掙点錢来养家活口。

时间过了一年光景，大约是阴历十一月间（现在推算是一九二八年），突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找上了我家门。这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年纪五十上下，神气十足。现在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的卖身契上的那个“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

张文善闯进我家门，就瞪着凶恶的眼睛问我母亲：“这是李金魁的家吗！？”

母亲听到父亲的名字，心想是父亲托人捎信来了，连忙回答：“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张文善掏出一张纸条，交给我母亲说：“这是你男人的借据，他欠我大洋二十元，上面写得明白，如若不能按时还债，情愿将小儿抵押，他现在无力还债，我来领小孩子。”

母亲顿时惊呆了。她一把拉过我，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我的孩子不能给你！”母亲怨愤地说。

“那好。”张文善冷笑了笑，说：“俗话说得好，夫债妻还，那你就还錢吧，限你三天本利还清。”他说完甩甩大袖子就走了。

隔了不久，张文善又来了。这次他把我本家叔叔也找来了，当着叔叔的面，逼迫我母亲马上还债付息。张文善还说，如果不还债，就要告官府打官司。母亲、叔叔百般哀求，也毫无结果。叔叔见没有办法，又怕打官司，就对母亲说：

“孩子留在咱家，也是挨饿受冻受苦，不如放他去听天由命吧！”

张文善也皮笑肉不笑地对母亲说：“你就放心吧，孩子留在我的身边，我一定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他说着就随手掏出一个白面饼子给我，又拉扯着给我套上一件半旧的小花褂，不等母亲同意，就强拉着我向外走。



母亲看着自己的亲骨肉被夺走了，跑上去搂着我，亲我

的小脸，哭着说：“我苦命的孩子，你娘对不起你啊！”在母亲哭晕了的时候，张文善就把我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了。

被 卖

这一年我仅仅六岁，新的苦难又开始了！

我离开母亲以后，张文善把我带到了大名府原城县（今山东省馆陶县）西河寨。我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为地主做木工。可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果，不仅没能挣上钱养活家小，反而欠下了债，最后被迫把自己的亲骨肉抵押给人。

在张文善家里，我记不清住了多久。我很想念母亲，整天啼哭。张文善便经常打我、骂我，并且吓唬我说：“小崽子，再哭我就杀了你！”当时，我虽然不懂事，但是，我怕挨打，我知道挨打的痛苦滋味，我还怕他真的杀了我。因此我有泪不敢流，哭也不敢哭出声来。记得到张文善家里不久就是春节，富人家的孩子无拘束地欢闹玩笑，而我象囚徒一样地被打骂着，不准出门，过着如同牲畜一样的痛苦生活。

春节过去了，张文善把我放出了笼。他对我说：“小二（他给我起的名字），我把你送回家去吧！”这时，我真高兴极了。我带着渴望重见母亲的心情，跟着张文善离开了西河寨。

我记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天，也记不清翻越了多少大山，跨过了多少河流。最后来到一个村庄，这就是山西省沁县的乔村。张文善把我关在乔村土豪劣绅王丙和宅旁的一间

小土楼里，地上铺着一堆乱草，寒风从土楼的窗洞里吹进来，冻得我浑身就象刀割一样难受。夜里，我蜷缩在乱草里睡；白天，我有时啼哭，有时爬在窗洞边看看街上的行人和玩耍的孩子，盼望着有人给我送点东西吃。

张文善从把我关进小楼后，很少来看我。大概是怕我跑了或饿死，他有时也给我送点吃的东西。这村的穷苦人们见我可怜，有的也送点饭给我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穷苦老爷爷和一位穷苦老妈妈。他们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有一次老妈妈还特意给我送来白面饼吃。她一面看着我吃，一面擦着眼泪叨念着说：“可怜的苦命孩子，哪一辈子造下的罪啊？”

我在土楼上大约住了五六天，渐渐地病倒了。不久，老妈妈把我接回她家，一口汤一口饭地喂我。老妈妈把我当成了亲儿子，我也把她当成了亲妈妈。

老人的苦难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我不知道。我在韩家老爷爷和老妈妈的抚养下，渐渐长大起来。他们为啥抚育我呢？直到这次找到了我的卖身契，我才算明白了。

韩家老爷爷和老妈妈，是乔村贫苦的人，老两口有一个闺女，早就出嫁了。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二亩半薄地。两位老人听说我是被人出卖的，便一心想救出我来作为养子，但是他们没力量，也没有钱。乔村的恶霸地主王阳看出了两位老

人的心意，就抓住了这个发财的机会，串通王丙和和乔村的村长、村副同张文善互相勾结一起，给韩兴盛老爷爷出了个主意：由王阳借给韩兴盛老爷爷钱，把我买下来。这就是卖身契上写明的那个“大洋五十元整，其洋笔下交清”的事实。而王阳借钱的条件是以韩家老爷爷的二亩半地作抵押的。

韩兴盛老爷爷买下我，他的灾难更大了。两位老人为了还债，尽管起早贪黑地劳动，结果，他们辛苦劳动一年的收成，大部要交给狠心的地主王阳，作为“大洋五十元”的利息。两位老人本来就很贫苦，这样一来，更是苦上加苦了。当我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到韩家的第六个年头，韩兴盛老爷爷担负不起这样的重债重息，终于贫困劳累致病而死了。在我和老妈妈埋葬老爷爷的时候，恶霸地主王阳就把我们的二亩半地全部夺走了。

从此，我和老妈妈就一无所有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呢？老妈妈到处求亲告友，好歹租了地主二亩地来种，可是，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要交地租，我和老妈妈累死累活，也无法生活。我到十六岁的时候，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就对老妈妈说：“妈妈，让我出去吧，我到外边挣点钱来养活你。”

老妈妈见我在家也要饿死，含着眼泪答应了。临走时，她还对我说：“孩子，别惦记我，我年纪大，不中用了，你好好去混碗饭吃吧；记住经常给家打个信。”

我告别了老妈妈——也就是我的第二个苦难的母亲，走出了家门。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分别，竟又是象我离开生身母亲一样，与救出我的、千辛万苦把我抚养长大的第

二个苦难的母亲永别了。

进了地獄

我离开家门，四处奔走，急于挣点钱养活我那受苦的二个母亲。可是，“天下的穷人一般穷，天下的地主一般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向哪里去挣钱呢？我奔走了几个月，不但没有挣着一个钱，就连自己也得不到温饱。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闯进了狼窝，在国民党匪军里当了兵。

在国民党匪军里，我受尽了人间少有的折磨和痛苦。我当兵几个月，身上就布满了皮鞭、皮带、皮鞋的伤痕。每天不仅挨打、受骂，还吃不饱饭，不久，我就被折磨得病倒了。记得我在病中，孤单单地躺在潮湿的草铺上，谁也不来过问。

在我病得昏昏如死的时候，匪连长叫人把我拖进了一座破庙，准备当作死尸处理。可是，我没有死，我又苏醒了过来，病也慢慢地好了。此后，我便下决心找机会冒死逃出这人间地獄。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黑夜，我终于和几个同伴一起，脱离了这个世界万恶的狼窝。

走向幸福

我从国民党匪军逃出以后，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从此，脱离了苦海，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我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我们的阶级敌

人。一九四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一九六二年九月，趁我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党组织特意批准我去找家。我便根据卖身契上的线索，来到山东省馆陶县西河寨，我把来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该村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很同情我，热情地帮助我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拉我抵债又把我转卖与人的张文善（已死）的弟弟张正善。他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家是在河南省清丰县，父亲名叫李金魁。但是，我家是在清丰县的什么村庄？因为岁月已久，他也记忆不起来了。党支部书记为了帮助我找到更可靠的线索，又亲自召集全村年纪大的人开座谈会，最后才打听到我的老家在清丰县的李家庄。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西河寨，匆匆地赶到河南省清丰县城。县公安局为了使我能顺利地找到家，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到了城关公社，公社党委又专门派通信员小李同志领我到了李家庄。我一走进庄子，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禁喊了起来：“家，这就是我的家！”啊！它完全变了样，和我记忆中的童年时代的故乡，完全是两个世界啦。过去衣衫褴褛的人们已换上了新装；村前那个臭水塘，如今清澈见底，一群鸭子自由自在地浮在水面上；农民们正在满面堆笑地忙着收割，眼前呈现着一幅农村大丰收的图景。当时，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跨进了家门，第一个见面的是我的堂哥，经过简短的说明，他毫不犹豫地高声喊道：“焕喜（我的乳名）你还活着呀！”当我和从小就当童养媳的姐姐

见面的时候，她含着热泪诉说了分离后多年的苦难遭遇：在当时痛苦的生活逼迫下，母亲在我被拉去抵债后的第三年就去世了，父亲带着我的哥哥到关外逃生去了。现在他们定居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六合村……。

以后，组织上又批准我到黑龙江去和父兄重聚。

现在，我的哥哥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生活得很幸福。父亲今年虽然已经七十五岁了，可是还很健壮，能做一些轻微



的活儿。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感慨地说：“孩子，咱们有今天，全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他不愿意再提过去，一提起来就悲痛不止。

我看到父亲今天的幸福，更加怀念我死去的母亲和养父养母，如果他们能够活到今天，看看我们的新中国该是多么好啊！

（焦金盃插图）

四 亩 二 分 地

洪洞县馬头公社板塌生产大队 何瑞泉

我父亲有个姑舅表兄，名叫郭廷良，也是俺板塌村的。解放前郭廷良一家，占有耕地四百二十亩，是洪洞县有名的大地主。我父亲十三岁时，郭廷良把我父亲叫到他家，“亲热”地拍着肩膀说：“来吧，咱弟兄还分什么你我，只要你好好干，表兄我亏不了你。”

我父亲当时很受感动，心想：这一辈子运气不赖，遇了这么个好亲戚，有了铁饭碗啦！于是，一年四季，辛勤地耕种、收割、喂牲口……，不论重活脏活，不分黑夜白天，使出全力地干了二十一年，把郭廷良的这份家业闹得更大了。沒料到，我父亲三十四岁那年，郭廷良的两个儿子郭辅唐和郭佐唐以闹分家为名，借故要撵走我父亲。我父亲一听火了，说：“我算看透了你们‘财主’的心！好，走就走，看我离开了你郭家能活不能活！”于是，他扛起舖盖卷气冲冲地离开了郭家。

我父亲身体好，有力气，就给人打短工，我母亲日夜纺花织布，不敢稍停。全家人勤劳生产，省吃俭用，好容易用裤带勒下的几个錢，陆续买下四亩二分地。父亲却因挨冻受

餓，勞累過度，五十五歲上就去世了。臨死的時候，把我母親和我叫到跟前，泣不成聲地說：“我……我总算對起……你母子了。……地……地是莊稼人的命，千萬要……要把地守住啊……”



“天呀，這可叫人咋過活呀！”我父親一死，我母親哭得死去活來。那時我才十四歲，含着滿眶眼淚，搖着媽的肩膀：“媽，你……你不要哭啦，我……我養活你。”媽突然把我摟到懷裡，嗚嗚咽咽，哭得更痛心了：“我娃還小哩，頂不住啊！你不知道，財主……財主的心比蝎子還毒哩……”

孤兒寡婦的，媽老怕財主暗算，一想起父親就哭。

一九三二年，大禍終於臨頭了。

郭輔唐看中了我家的地，又聽說我十八歲了還沒訂婚，打着“關照”親戚的幌子，找上了門，對着我媽，試探地

说：“表婶，这几年你闹得不错呀，也该给表弟娶个媳妇了。”

“你表叔死后的债，今年才还清，哪有余钱讨媳妇？缓缓气，往后再说吧。”

郭辅唐知道俺家底细，“亲热”地对我妈说：“别多心，要用个钱，就说话，给旁人都借，还能没你借的。”

借钱的心事，我妈早就有了。郭辅唐一说，正合了她的心意。她想：借就借点吧，将来迟还几天，好坏是个亲戚哩，他还能逼债？终于说：

“可是，借了你的钱，咋还呀？”

郭辅唐越发“亲密”起来，非常“大方”地说：“甭怕，啥时有了啥时还。别人借钱，一律押‘红契’（注一），你借，不押。别人是三个月本利还清，你是一年。一件好事嘛，你侄儿还能不成全成全。”

母亲一时被感动得几乎流下泪，觉得还是“亲戚”好，旁人谁替咱操这心、出这力呢？便说：“好，就借给我七十五元吧，办了事，想法子还你。”

拿钱那天，郭辅唐找人写了白纸借约，还说了许多人情话：“给我留下个手续，往后还不还，总知道有过这回事。”

那时，咱这里十年九灾，苛捐杂税又多，莫说咱这穷家，比咱强几倍的，一年也余不下几个钱。眼看还债日期到了，家里却连买盐的钱也没有。第二年秋后，郭辅唐讨账来了：“表婶，一年零三天了，那钱……准备好了吧？”

“唉，今年收成不好，你……”

沒等妈说完，郭辅唐又开了口：“哎，咱不能过了河拆桥嘛！当初说得明白，一年！期限到了就该还，一时不便，也该想法子，活人总不能让屎尿憋死呀！”

一听这话，妈的脸色变了。她的嘴唇动了儿动，却没有说出话来。她知道郭辅唐话里的意思，心想拿“表婶”的身份，求求郭辅唐，再宽限宽限。可是一看郭辅唐气凶凶的脸，她没有敢说。该人家的还不了，有什么法子呢？无奈，把“斜道里”一亩六分上等水地的契约递到了郭辅唐手里：

“这块地给了你吧……”“要是旁人，这点地就顶不了那么多钱。”说罢郭辅唐拿上“红契”扬长而去了。

“怪不得人骂郭辅唐是活阎王，真的是个杀人不见血的活阎王！”母亲决心不再和郭辅唐打交道了。

又过了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我二十岁了。媒人几次催我母亲快搬亲。母亲干着急，没办法，哭了一次又一次，给我说：“你这媳妇搬不过，我死也合不上眼。”

正在这时，郭辅唐的弟弟郭佐唐来了，这人装得可绵善哩，一进门就笑：“哈哈，表婶呀！你这大年纪啦，表弟也不小啦，给他把亲搬过来，一桩心事就了结啦。”

“小哩，过几年再说。”妈警惕了：第一次说了违背她心思的谎话。这时，郭佐唐忽然神秘地凑到我母亲的耳边说：“共产党快来呀，人家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穷的富的都不饶。你想想，要是共产党真来了；年轻的闺女、媳妇……”

妈忽然打了一个寒噤。“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的话，国

民党还编成歌曲，强迫群众唱过。她每次听到这句，心里就害怕。现在郭佐唐这么一说，她的脸色都变啦。妈的表情，郭佐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看风驶舵地说：“把媳妇娶过来，就是逃出去躲避，他两口相跟上，咱也放心。要是不过门，兵荒马乱的，可就沒个准儿了……”

几句话打动了妈的心。她想：世界上还能尽是狼心狗肺的人？佐唐说话替我想得多周到，恐怕不是辅唐那号人。便说：“要一文，沒一文，拿什么搬亲呢？”

“用多少你说话嘛！”郭佐唐兴奋地站起来，准备回去。走到门槛，回过头来，又殷勤地对我妈说：“哈哈，表婶，什么时候用，就来拿，嗯！”

我妈又“得数”了，她眉开眼笑地找媒人，走亲戚，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天，妈去找郭佐唐，想把要借的錢拿回来，准备到时好送彩礼。郭佐唐当时沒给，答应得倒挺大方：“该准备什么你先准备着。錢便当，不过你最好甬拿。时世太乱，你的院子又野，半夜有人来打劫，多危险？我家有盒子枪，人手也多，保险。放到我柜子里，还不和在你柜子里一样？送礼的时候再拿吧，嗯？”

妈觉得人家佐唐的话在理，是真心帮人。点点头，滿意地回来了。

娶亲的日子到了，媒人和两家亲朋請来了。吃过酒席，按当时旧习俗，就要当面点送彩礼。可是事到眼前，手里一块錢也沒有。开席前，妈又去請郭佐唐，請他带上答应借给的錢，来吃酒席。不料，这回郭佐唐偏偏不来。借錢的事，

他只字不提，却搭讪着说：“招待客人去吧，我今天没工夫。咱是自己人，得罪不了。嗯！去吧，招待人家去吧！”

“我是说……”母亲正说借钱的话，郭佐唐急忙“客气”地把她推出来了。

送礼的酒席吃完了，郭佐唐还是请不来。郭佐唐不来，没有钱，礼送不成，亲就不能搬。妈急得团团转，不时用袖子擦眼泪。这如何是好呢？妈想：要是当初不听郭佐唐的话，暂时不请媒人不送礼，再过个一年二年，宽裕些了再搬亲，也省得“坐火熬”。如今骑虎难下，不光丢人败兴，媳妇也有吹了的危险。

我姐夫吞不过，他以亲戚身份去找郭佐唐。郭佐唐哭丧着脸说：“咱家也是一时不便呀！原先估计到这时钱就回来了，谁知道那些穷鬼们不还，唉，真是气人！”郭佐唐见姐夫没吭气，又说：“这么办吧，我找别人‘转’去。咱有这个破家，就是‘转’也比她好办些，十有九成能借到。不过……不过，咱这里的规矩，你全知道……我总不能押上自己的地，去给旁人借钱呀！”

啊！窗户纸终于戳破了。原来，郭佐唐也是看上我家仅剩下的那块好地了。

姐夫回来一说，妈哭了，我哭了，不象办喜事，倒象是死了人。我说：“妈，算了，咱不搬媳妇啦！”

这时，郭佐唐来了。脸色还是很绵善：“怎么办？快定一下，我还有事哩！”说完扭身就要走。妈赶快央求人家：“搬了媳妇，加了人，没有地种，可叫我这一家咋过呀！你

……”郭佐唐很自然地接上了话茬：“唉，看你这人心眼多死！人常说：‘田地房屋转百主’哩。现在用錢，卖了；过后有了錢，还能置嘛！再说，咱家几百亩地哩，还怕沒你种的！”

越来越明显了。原来，郭佐唐是想叫我们世世代代给他家当佃戶、扛长活呢。

妈想一阵，哭一阵，总觉得我的亲事要紧，无论如何不能在亲事上打退堂鼓。她终于用颤抖的嗓音对郭佐唐说：

“好吧，你拿錢去吧！”把仅有的“娘娘庙”二亩六分头等水地，作为抵押，按“八当十，四分息”（注二），請郭佐唐“转借”了八十块銀元。

不用问，第二年郭佐唐按“章”夺了地。

娶了媳妇蕩了产，哭不得，笑不得。我媳妇回了娘家，俺母子俩哭了不知多少回。妈哭得最伤心，口口声声说：“我对不起你爹，我……”

可郭佐唐还是“慈善”地对妈说：“不要怕，那二亩六分地，你还种着。反正别人怎样你也怎样，还能亏了你。”

有什么法子呢？庄稼人沒了地，怎活？只好接受下来，继续种。租子是，“加二五”的大斗，一亩地一年一石。从此，“子承父业”，我也给财主当开牛马了。

租种地主的地，可不比种自家的地。遇到好收成，还能吃个三斗二斗，遇到旱涝灾害，就更倒霉了。我“租”地头一年，就遭了涝灾，秋庄稼收得很不好。把盆盆罐罐里的都集凑上，也只盘了两石二斗。狗腿子刘三元，把斗敲得当当



响，叫着：
“装，装！”
郭佐唐不哼不哈，站在一旁斜瞅天。看着快装完了，妈含着泪又央告人家：“实在没有了。差下的四斗，明年秋季一齐交吧……”

人说：

“穷汉吃得亏”。吃不得亏有什么法子呢？日日夜夜，好容易盼到收了秋，家里却没一颗粮。吃糠咽菜地备足底肥，把小麦种上，我就去担挑糊口。

第二年春天，小麦返青拔节、吐穗、扬花，长得很好。我想，今年夏季有个奔头，我妈和我媳妇，嘴角上也露出了笑容。“芒种”前，我担挑回来路过地边，看见我种的麦已经收割完了，佃农李长荣正在放水浇灌，准备种回茬玉茭。

“这是咋回事？”我很奇怪，一时竟有些晕头转向了。把眼睛揉了揉，看看左右地邻，看看地头的渠、路……没错，

就是我的地。

李长荣抬头，见我楞在地边，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回来了？这块地，郭佐唐租给我了。”

不好！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眼睛都发黑了。昏昏沉沉回到家里，把拟子摔在门口，一头倒在炕上。妈见了我，哭得说不成话：“你……你不在，人家把……把麦收了，把地也……也夺了！”

“天哪！这不是活活害我一家人死吗？”三口人都把眼哭红了，哭肿了。

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时，我们和从前的那一伙穷弟兄们，都分了土地分了房，以前愁眉苦脸的佃农和贫农，都乐滋滋、喜洋洋的，生产劲头可大啦！

经过土地改革，我明白了一条真理：不论说到哪里，还是咱们阶级弟兄亲，党和毛主席亲！有了今天的好日子，不要忘了过去受财主的罪，更不要模糊阶级界限。

注一：旧政府印有“关防”的契约。土地或房屋的座落、东西南北四至，都很详细。是受旧法律所唯一承认、保护的约据。

注二：八块顶十块。借给穷人八块现洋，到了期限，按十块还本，付息。

（洪洞县委中心通讯组整理）

（焦金盃插图）

紡織女工話今昔

晉生紡織廠女工 任木香

我叫任木香，是晉生紡織廠的女工，今年三十六歲。我愛人是大學畢業生，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太原兩授輔導站工作。我們有三個孩子，大的上初中，兩個小的上小學，都是“紅領巾”。看到現在的生活這樣幸福，不禁回想起我泡在淚水里的苦難童年。

死里逃生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安陽縣。我小時候，家里有父親、母親，一個哥哥，兩個弟弟，兩個妹妹，靠租種地主的土地維持生活。記得我十一歲那年，家鄉遭了大災，把秋收全部送給地主還不夠繳租，狠心的地主每天三番五次上門催討，逼得我父親白天不敢回家。偏偏在這時候，我們兄弟姐妹六個全得了重病。鍋里沒米，灶下沒柴，哪有錢吃藥看病呢？窮、病交加，不幾天就死了一個弟弟。接着，哥哥、另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相繼死去了，就剩下我這個女孩子還是半死不活的。聽母親說，那時真是跌進黃連罐里啦，有說不盡

的苦。父亲在外躲租，眼看亲骨肉一个个死去，母亲痛得真是要抓心啊！她抱着有病的我，哭一阵，昏过去一阵。光哭也不行，还得刨闹吃的，一颗粮也没有，吃什么呢？野菜。母亲领着我去挖了一大盆野菜，回来煮了又煮，泡了又泡，据说这样吃下去可以不中毒。可是我那时年纪小，又有病，吃了两顿，浑身就肿起来了，眼睛溃烂，不几天就瞎了一只。母亲搂着我哭哭啼啼地对父亲说：“就剩下香儿这一棵苗了，可得想个办法啊！”父亲心里难受得象插了把刀子，思谋不下个出路。母亲又说：“难道咱就在这里活活地等死吗？”一句话提醒了父亲，决定离开老家另找生路。记得父亲把全家所有的破烂被子和衣裳捆成一个小卷，母亲又捧出三个碗、三双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上路了。边赶路，边讨饭。有一次讨不下饭，就把破衣裳、烂被子也卖光了。过了好多日子，才连滚带爬地到了太原。

本来听说太原是个好地方，但到太原一看，也是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只好白天在马路旁边，叫几声爷爷奶奶讨几个钱。有时一天也讨不下一口饭，就只好瞪着眼饿一天。有时遇上恶棍、当兵的，还要挨上一顿拳打脚踢。晚上我们全家三人就睡在城墙底下，盖着父亲从垃圾堆里拾来的一块破草包片。这样过了大约两个月，父母都染了重病，爬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我就只得一个人伸着小手向人家讨钱要饭。侥幸要上点残汤剩饭，还可给父母充饥；要不下，心里真象刀搅一样地难受。不到半个月，我的父母就病饿而死了。原来全家八口人，这时只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幸亏有个

同乡看我可怜，就把我领到一个姓任的穷人家当了童养媳。

三 次 被 开 除

穷人的生活都是一样苦。婆家生活也是少吃没穿的，全家六口人只靠公爹一个人挣钱糊口。无奈，我十三岁就到晋生织染厂（晋生纺织厂的前身）当了童工。那时太原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工人过的是牛马般的生活，而且连这样的生活也毫无保障，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

有一次我病得爬不起来了，浑身烧得象个火团，实在不能去上工了，在家睡了两天。第三天，我强打着精神爬了起来，婆母扶着我去上工。哪知一到厂门口，就看见公布栏内贴着一张告示，听说里面写的是把我开除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只生了两天病，就招来这么大的灾难！

全家人要生活啊！没有办法，我只好经工友们介绍，去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当佣人。整天揩孩子、洗衣服、做饭，累得我半死，他们还故意找碴儿，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他们家养着一条大狗，吃的是肉块，喝的是肉汤。而我呢？剩饭、菜汤还吃不饱。这是什么天下！

过了六个月，晋生织染厂又招收工人，我又二次入厂当了童工。那时学点技术真难啊！我在细纱车间打杂一年半，还没有学下接头。有一次，我扫完了地，偷偷地站在机旁，想学一点接头技术。哪知刚要伸手去接，不慎碰倒了筘带，把纱头打断了。工头一看是我，就怒气冲冲地骂道：“你这

个瞎眼货，快给我滚开些！”说着就是两耳光。又有一次，我问另一个工头，能不能教我一点技术，他把嘴一撇，也斜着眼说：“快走开！技术不是你学的。”看来在机器上学技术是没有希望了。但我还不死心，于是就拿着纱管偷偷地学。有时乘工头不在，我就向好心的姐妹们学。最后总算学会了一点技术。工头看我有点门道了，就让我挡车。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工头第一天就叫我挡二百锭的车子。那时二百锭就是最多的了。初次操作，手生心急，一上车就忽鲁鲁开了大花。驻厂的日本鬼子岡田看见后，举起一根二尺长的铁杆劈头就打，奴才工头也跑来拳打脚踢，直打得我头昏眼黑，不省人事。等我醒过来时，才知道我不是在车间里，而是在大门外。姐妹们告诉我，是工头把我推出来的。这是我第二次被工厂开除。我想爬起来，但浑身痠痛。好心的工友看着过意不去，才扶我回了家。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又去工厂补了名额。日本人走了，中国人的天下该好一些吧？没有。闫锡山是穷人的阎王，工头还是工头，工人还是做牛马。这一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那时，女工一有了孩子，就不许上工了。这真是个威胁。为了不被工头发现，我就用布把肚子紧紧缠住。产期一天天近了，我越感到大难快临头了，成天价提心吊胆。又听说某厂有个女工，怀孕后用布裹肚子，后来把孩子生在厕所里了，她怕被开除，还是坚持上班。但不知怎么，被工头知道了，说是不吉利，硬把女工也逼死在厕所里了。我越想心里越害怕，不知我生了孩子后会有什么灾难。不多日子，

我就生产了。和所有生孩子的女工一样，我也被开除了。

无故开除工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手段。入厂久了要按工龄发工资；把你开除了，你不得不再来，人还是你，工龄从头算起，工资就可以少发。我就是资本家这种鬼把戏下的牺牲品，三次被开除。

生 活 苦

为了生活，我又四次入厂了，每月还是两元多的工资。这点钱即使全用来购买粗粮，也很难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何况又添了一口人，生活就更加困难了。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婆婆一早就抱着孩子在门口等上了。婆婆拿上这点钱，根本谈不上买粮食，只能买些税高粱、粗粮，和在一起磨成面，配上野菜吃“拌烂子”。我上班带饭就带的是这种“拌烂子”。就是这种“拌烂子”也吃不到月底。接不上时，婆婆就抱着我那三个月的孩子沿街讨吃。公爹和我爱人四处寻活打临时工，但三天就有两天闲，还是难于糊口。

有一天我病了，什么也不想吃，婆婆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点红面，单给我做了一碗糊糊饭。我闻着香喷喷的。但看到一家老少都吃的是糠“拌烂子”，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吃这种好饭，就推说吃不下那么多，只喝了一口，就让大家都分了点尝尝。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嘴里有那股香味。

今天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国家把孩子看成花朵、后代、接班人，从小就有托儿所、幼儿园，百般照顾。可我们

那时候，父母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有了孩子更是活受罪。我生了孩子不几天就又进了工厂。每天婆婆抱上孩子到工厂去让我喂一次奶。那时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中间休息时间很短，经常是一面奶孩子，一面往嘴里扒糠“拌烂子”。再说，那时奶孩子根本没有地方，不是在大门洞里，就是在厕所里。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寒风透骨凉，把孩子的嘴都冻僵了，当妈妈

的看着真心痛啊！

有一天大雪纷飞，有位好心的工友说：“工头不在，你把孩子抱到车间去喂奶吧！”我到了车间刚解开衣扣，就碰上工头回来了。二话没说，上前朝我胸口就是一脚。把我踢倒了，孩子也跌落在地上脸朝天。现在回想起来还想把那个家伙咬两口。



我要把一切献给党

黑夜总是有尽头的。一九四九年太原解放了，党把我救出了苦海，真是拨开乌云见青天。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我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经常回想过去，对比现在，日夜思谋：“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上刀山跳火海，也不喊半个不字。”每当想到党，我就浑身是劲，在生产上只有一个心眼：出色地完成任务。一九五六年领导上调我到内衣车间工作。到这里要少领十几元工资。有的同志劝我不要去。可我想：“少挣十几元是小事，服从工作需要是大事。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欣然服从了领导的调动。到了新岗位，我加倍努力学技术，决心不叫生产受损失。经过同志们的帮助，一个星期后我就能独立操作了，产量由五十多公斤提高到七十、八十、一百，现在已达到了一百三十公斤。

(凯 旗整理)

(刘 沙插图)

我的腿是怎样拐的

太原印刷厂工程师 史志祥

苦难的家庭

我的家住在浙江省宁波县农村，后来迁居上海。家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妹妹和我。

听祖母说，在我出生前，家住农村，地无一壠，父亲年幼，全家人的生活，都靠祖父在农忙时给地主打短工、在鱼汛期给资本家打鱼来维持。祖父出海打鱼，驾着资本家的破船，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祖父给地主打短工，吃的是发了霉的糙米饭、烂腌菜，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天黑下来才能回来。祖父这样为资本家和地主干活，所得工资，仍难让全家人吃上饱饭。没有办法，祖父才领着全家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祖父先在码头上当装卸工，后来又当水手。

祖父当装卸工时，受尽了把头的惨酷剥削。一天干十五六小时的活，累得腰痠腿疼，赚到一点工资，还要被把头扣去二成。在码头上扫些撒落的粮食，也要弄干净送给把头一半。当码头上没活的时候，还要无偿地给把头家劈柴、担水、做杂活。逢年过节，必须给把头送份厚礼。不这样，他

就会踢掉你的饭碗。

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祖父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干，可是工资有限，和在家乡一样，仍然难以养家活口。实在沒有别的办法啦，祖母才硬着头皮到土耳其人开办的太培烟厂当女工，父亲也跟着当了童工。进外国人的烟厂做工，是经过思想斗争的。生活逼迫，祖母才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这条不很体面的道路。不久，这个烟厂被英美帝国主义的烟厂挤垮倒闭，祖母和父亲失了业，家庭生活又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

缺吃少穿的家庭，把祖母折磨得生了病，不久，她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父亲离开烟厂，就到处流浪着打临时工，好歹混口饭吃。到冬天，父亲的棉衣又破又薄，冻得没有办法时，就撕下厚厚的“海报”（墙上贴的戏报，一层压一层，越贴越厚），拾些草绳和烂布条子，把它捆在背上、腿上挡寒。

母亲是贫苦农民的女儿。她给人家做针线，还给富人家的太太小姐梳头，挣几个钱补助家用。听母亲说，给那些太太小姐梳头，人家坐着咱站着，好话说给人家听，笑脸摆给人家看，就这样小心谨慎地伺候人家，可是那些太太小姐还是多方挑剔，不是呵斥你梳得重梳得疼，就是骂你多梳掉了她几根头发。母亲时常唉声叹气地说，挣富人几个臭钱，真不容易啊！

后来，祖父也因长年受苦而得了重病，没钱医治，生活又困难，不久就死啦！他死后连个棺材也买不起，船主根本

不管。父母亲不忍祖父尸体席卷埋葬，便求亲告友，高利借贷，买了个薄皮棺材把他发运了。

为了埋葬祖父，我家借了外债，家中的生活更苦了。我记得，最差最差的米也吃不起，只得买些发了霉、生了虫的“锅圪巴”，用水泡泡吃。热水一泡，虫子都漂出来啦，我见了就怕得要命。为了不餓肚子，只好闭着眼睛硬往嘴里塞。我母亲沒黑沒明地给财主家做衣衫，沒时间也沒錢照顾我和妹妹。我们两人连鞋也穿不上，冬夏都是光着脚拖双木板。提起穿的，更是伤心，补丁罗补丁，窟窿挨窟窿，十冬腊月，衣服遮不住肉。日子实在沒法过啦，父母亲才不得不狠心把我妹妹给了人。

祖父死后，经船上水手们求告，船主才允许我父亲接替祖父在船上当水手。当水手虽然比打临时工固定些，但工资很低，全家生活仍然沒有保障。父亲为了多干活多挣錢养家，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家务担子完全落在母亲肩上。

我就是在这这样苦难家庭出生和成长的。

腿是怎样拐的

十三岁那年，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送到上海鹤记铁工厂当了徒工。

进厂之前，厂方规定，学徒四年不能回家，衣被自备，厂内管吃不管穿。我沒有一件囫圇衣服，家中也沒有多余的被子，怎么办呢？母亲只得借了几元錢，给我縫了件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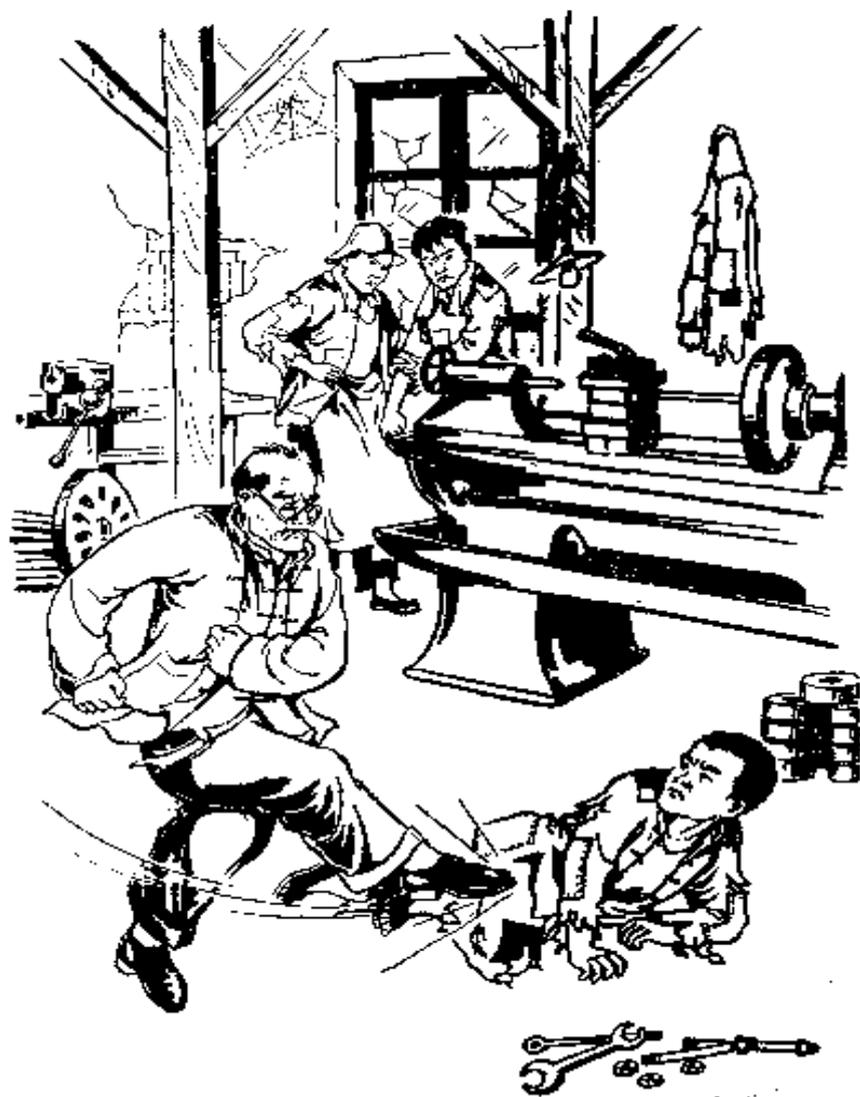
做了条被子，送我进了厂。我记得，进厂时还订了一份“关书”（合同之类的文书）。关书上写着，徒工病、死、伤、残，厂方一概不管；中途辍学，要赔偿饭费……。现在想想，资本家的心是多么狠毒呀！

当时鹤记的买卖很兴旺，获利很大。这对工人并没带来半点好处，只是加重了劳动强度，延长了劳动时间。工人被迫从早上五点干到夜里十二点，吃饭的空也不给多留。徒工们就更苦了，经常是深夜一两点钟才能睡。

鹤记老板吝啬得要命，天天在工人身上打算盘。工人们干活弄得满手油泥，洗手时连点肥皂沫也不给。擦机器要工人自己找破布或用自己的破衣服。工人们晚上睡觉，老板为了省电费，不让开电灯。一天夜里，我搬被窝摸到破裂的电线上，触电摔倒，摔得头破血流。出了这样事故，老板仍然不准开灯。工人们，特别是徒工，连个住处也没有，夜间就睡在车床底下。老板吝啬得连张窗户纸也舍不得买，到了冬天，东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睡在洋灰地上，冻得真是够呛。没办法，我们就偷偷地拧开电灯，把灯泡拉到被窝取暖。

徒工除了干活以外，还要伺候老板。每逢老板打牌，徒工就得站在一旁端茶、点烟，听差遣。稍有不到之处，就会挨骂挨打。挨骂挨打，是徒工的家常便饭。有一天晚上，老板外出看戏，回来很晚，我因为疲劳过度，坐在地上睡着了，老板叫门，我开得慢了点，他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打来，嘴里还不住地骂，把我的脸打得红一块紫一块。

最使我痛恨的，是我的腿被狠心的老板打成了终身残废。一个初夏的早晨，我正干活，老板叫我给他买早点。因为机器和铁锤声响成一片，我没听清他的话，迟疑了一会儿，他便气凶凶地把我拉过去，拳打脚踢，把我踢倒还不解气，又连着朝我胯部狠狠地蹬了几脚。当时我感到剧疼难忍，全身好象瘫痪了一样，想爬也爬不起来。可是怕继续挨打，只得硬咬着牙慢慢地站了起来，因为疼得厉害，站起来还不能迈步。这时，老板看我站着不动，反骂我“装蒜”，



顺手又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顺口流血，差一点栽倒。为了要吃饭，为了避免再挨打，我只得忍痛含恨，一步一拐地把早点给他买了回来。

回来之后，我的下半身象刀扎一样的疼，实在不能再动弹了，就偷偷地躺在车床旁边的墙脚下。后来，胯和腿都肿了起来，紧接着尿也尿不出来了，全身发高烧，一连四五天不能吃饭。

狠心的老板看我不能干活了，不但不给我治病，反而把我母亲找来，逼她带我回家。母亲看到我这个可怜的样子，看见我那肿得发亮的大腿，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母亲想到带我回家后的种种困难，不得不按捺着满腔怒火，向老板说好话，要求留下我并给我治病，工友们也从旁求情，可是结果都不顶事。就这样，我被推出了鹤记工厂的大门。

回到家中，没吃没喝，更无钱治病，所以病一天比一天厉害。后来在邻居的劝导和帮助下，又花了十多元托了个人情，才住进了德国人办的“同济医院”的“免费病房”。当时有人说这是慈善医院，是专为穷人设的免费病房。其实那都是帝国主义玩弄的骗取中国人心、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鬼把戏，“免费”是幌子，实际上他们的药费、检查费比一般医院还贵。住院期间，洋大夫说我的胯骨被打坏啦，不打针，也不敷药，只是用板子给固定了六个星期。住了三个月，胯没好，烧没退，洋大夫却催我出院。

出院就要交住院费。虽说床位不要钱，可是别的方面却算钱很多。我家这样困难，到哪里弄这笔钱呢？家里的破烂

衣物都当卖完啦，连母亲借以寄托精神的香炉也卖啦，还是付不起住院费。实在没办法，母亲才向邻居们借了八十元钱，把我接出医院。

出了院，仍然不能行动。母亲再也无力筹钱给我治病了，就到处找偏方。幸好偏方起了一些作用，两个月以后，烧退了，胃口也开了，但是腿怎么也伸不开，从此落了个拐腿残废。

这场灾难，害得我家的生活更苦了，家中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在生活的逼迫下，母亲含着眼泪劝我去复工。当时，我真宁愿饿死，也不愿再回鹤记。可是看到焦愁的母亲，看到家中的困难生活，我实在想不出别的门道，只得含着泪别离了母亲，拖着沉重的拐腿，又回到吃人的鹤记铁工厂。复工后，腿经常疼痛，站久了就要晕倒。幸而有几位师兄弟经常帮助和关怀我，我才苦撑到学徒期满。

学徒满期，资本家的花招又来了。老板要我把因养伤而“耽误”的七个月的工补上，我母亲好话说了千万遍，结果只减了两个月。我又苦熬了五个月。这时，资本家又强迫我交十元钱的“谢师费”。天老爷，前债尚未还，再到哪里弄十元钱啊！最后托人说情，又给他多干了一个月才算了事。

我出师后，就离开鹤记另谋生路。在那吃人的社会里，到哪里去谋生路呢？求亲告友也找不到个固定职业，只能找些临时活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生活仍无保障。后来听师兄弟们说，内地可能比上海好一些。于是我们师兄弟七人串连一起，在一九三〇年来到了山西。当时正赶上榆次华北烟草

公司（后来，这个公司与太原烟草厂合并，迁至太原）招工人，便投入该厂。开始还可以，后来外国货充斥市场，许多工厂接连倒闭，华北烟草公司也受了极大影响，不得不大量裁人。我们七人被裁掉六个，只留下我自己。为什么留下我呢？不是资本家照顾我家庭贫苦，而是因为我虽然拐腿，但年轻力壮，工资最低，而且对卷烟机能修能开，那六位会修不会开。我在这家公司，虽然流了不少汗水，那只是替资本家当牛马，我全家人的生活，仍然是十分困难。

在吃人的旧社会，常听那些资本家大老板们说：“工人的‘工’字不能出头，出了头就变成‘土’字，变成土你就快要死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工人服服帖帖地永远替他们当牛马，休想扬眉吐气、出头露面。请看，资本家是多么阴险狠毒呀！

天晴见太阳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难忘的一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太原。从此，天晴了，满天乌云驱散了，我和全国穷哥们一样，看见了太阳，永远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经济上也翻了身。

太原解放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的军代表派人把我接去，热情地接待了我。军代表说的每一句话，就象千万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我认识到共产党是咱穷苦人的大救星，所以我把埋在心里几十年的苦水都倒了出来。此后，我就竭尽一

切力量，协助军代表在厂内进行恢复生产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简直不知疲劳，好象恢复了青春。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啦，我认清了真理，我下决心把一切力量和智慧，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人弟兄们给了我很大的信任，把我选为太原烟草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五〇年一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我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这时，党又提拔我当了车间主任、技术科长。一九五九年又提升为工程师，后来，才调到太原印刷厂工作。

旧社会害得我拐了一条腿，缺吃少穿，家破人亡。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给我带来了幸福，使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

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使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生活成长在幸福美好的社会里，我向党和全国工人弟兄们保证，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指引下，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做好工作。

(亚澄整理)

(刘沙插图)

苦水倒不尽 幸福說不完

太原市柳巷百貨公司老店員 樊久亭

我是不願意在人前談論往事的，一提起過去，我就忍不住滿眼淚。

我今年四十五歲。在舊社會，我受盡了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裝了滿肚子苦水，僥幸落了個死里逃生。我出生在一个貧農家庭里，七歲那年，家鄉是個大荒年，多數窮人沒糧吃，靠吃野菜、樹皮為生，有的人扶老攜幼，離鄉背井，投奔親友。我家呢，親友也都窮得過不下去，又怎能向他們請求幫助。沒辦法我父親忍痛把全家仅有的兩床破被子和母親出嫁時穿過的衣服賣掉，才勉強熬過了苦難的災年。十二歲那年，年景好轉了點，父親勒緊褲腰，供我上了學。因為半耕半讀，雖然混了三年半，實際上斗大的字沒認下幾個。父母親認為我學下了一點本事，就東托親，西拜友，好不容易才找到老娘家的一个鄰居，把我介紹到太原德盛恒玻璃店當了小伙計。

挨打容易，學生意難。十六歲的我，隨時都可能遭受資本家的打罵。剛進店的第二天，店掌櫃就讓我記帳，急得我抓腮搔耳不知所措，忙找師兄請教，師兄不但沒給指點，反而

讽刺说：“学买卖不识字，是干啥吃的？”无奈何，只好自己揣摸着记，结果写错两个字，三掌柜发现后，瞪起眼睛怒骂道：“你这个废物，白吃饭的东西。”说话间，就是两个耳光，打得我顿时头昏眼花，脸烧心酸，想哭不敢哭，只得咬紧牙关，把闷气嚥进肚里。这是我进店后第一次吃苦头。以后生活怎么样？先从住和吃上说起吧。

店里有一间小破楼，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资本家腾出二尺宽的窗台，给我安顿了个睡觉的地方。炎热的夏天，蚊子、跳蚤，特别是臭虫，多得象蚂蚁“赶会”一样，成群结伙地向

我围攻，咬得我通宵不能安睡。无奈何只得用簪帚扫扫，睡一阵，再扫再睡。冬天，孤楼上，不给生火炉，又没有好铺盖，晚上只好钻进自带的小破被里缩成一团，上面再压些破板凳御



寒。如果遇上刮风下雪天，更是整夜冻得睡不着觉。吃饭呢？资本家、太太、小姐、少爷们，围住圆桌团团坐，大吃大喝，小伙计只能饿着肚子站在旁边给端菜盛饭。有一次，我给店掌柜端饭，顺手往身上揣了一个馒头，不幸，被他们看见了，资本家气凶凶地上楼去把我的破被扔下来：“噏，噏”，又踢了两脚，骂道：“滚蛋，快滚！……”并把我推出门外。往哪里去呢？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也没穷人的活路。想着想着，只得抱头跑到“老爷”跟前，跪下苦苦哀求。师兄们看我可怜，都帮我央求资本家，这才勉强把我留下。又有一次，我外出买玻璃回来悞了饭，大师傅悄悄地给我烙了两张饼，我拿到手里正准备吃，被掌柜的看见了，责问大师傅说：“谁叫你给他做烙饼？”又指着我说：“你有了什么功劳啦？还吃烙饼，在你家连稀的还没有呢！”跑了一天，晚上连饭也没吃上，饿得肚里咕咕直叫，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又恨又伤心，眼淚不断往肚里瞧。

在旧社会当店员，莫说吃不饱穿不暖，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一天到晚给资本家提茶壶、端酒壶、倒尿壶、铺床、迭被，一不留心就要遭受打骂。当时，店里有个姓孟的掌柜，店员们背后叫他“孟司令”。这家伙，不知吸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不知有多少店员吃尽了他的苦头。有一天晚上我给他把油茶熬好了，因没找到他常用的口杯，便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尽管再三说明，“孟司令”还是把油茶一推，脸一翻，狠狠地说：“不给我找见，今晚就别睡觉！”这一夜我就没敢去睡。平时，“孟司令”手摇蒲扇坐在大藤

椅上喝茶，小伙计不紧不慢给他倒。晚上给他铺床不许褥单有一絲皱纹。有一天晚上，孟掌柜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把我叫到跟前，二话没说，扭住耳朵就打。打罢，才气凶凶地问：“混蛋，要眼睛干吗？褥子是怎样铺的？”我偷偷一瞧，才明白：原来是一个褥角没铺展，赶忙上床整弄平，不料刚上去一条腿，孟掌柜又连踢两脚。象这样挨打受气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又一天早晨，二掌柜到厕所解溲，看见粪坑里扔着两个破碗，硬逼我承认是我打的。我抱冤地说：“掌柜的，这不是我打的，不信，你再问问旁人。”话没说完，一条木板劈头劈脑就打过来，顿时我就两腿发软，昏倒在地。孟掌柜看见后还喝采助兴地说：“打得好，打得对！”晚上，我脱衣睡觉，才发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渗出了鲜血。次日早晨，浑身疼痛万分，有谁可怜我呢？只好咬住牙，忍住痛，勉强下床，继续干活。这次我没有哭，只在我心里添了一笔仇恨帐。

在资本家那里干活，常是晚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早上不到五点就得起床，有时实在困乏得支持不住了，就用冷水冲冲头洗洗脸，刺激一下再继续干，稍一打盹，就要挨打挨骂。店里伙计们的遭遇，和我一样悲惨。一天下午，正在吃饭的时候，运到了两马车玻璃，孟掌柜立刻命令大伙放下饭搬货。玻璃放在木箱里，每箱重一百五十斤，不论大小人，每人每次背一箱。大家急急忙忙搬完货就吃饭去了。这时，只见十七岁的申金书抱着肚子跑进家里，躺在床上直打滚，嘴里不住地喊：“爹呀！娘呀，活不成啦！”我急忙问：

“怎么啦？怎么啦？金书，是肚疼吗？”他只是一股劲喘着气叫喊，我看情况不好，知道是刚才搬货使坏了身体，赶忙去求告孟掌柜。谁知狠心的资本家竟拿人命开玩笑，坐在竹藤椅上皮笑肉不笑地说：“申——金——书？混蛋，他是装病哩！”经过再三央求，才算扔出两毛钱让买药去。等我买回药来，还没喂进病人口里，只见金书微微睁开眼睛，说了声：“久亭哥，我不行啦，咱们见一见一见不上啦。”话没说完就闭上了眼皮。看，这就是侍候资本家的下场。

为了赚钱资本家是不择手段的，见了阔老爷阔太太，总是献殷勤说好话，见了穷苦老百姓则是能骗就骗，能欺就欺。有一天，一个农民模样的顾客来店买碗，他不挑不拣买上两个碗，付了钱就走。我看见他买了两个破碗，良心上过不去，就叫他回来换了两个好碗，那位顾客很感动，连声道谢。不巧这件事偏偏被店掌柜看见了，他过来就是两个耳光，并恶狠狠地骂道：“你究竟给谁干活呢？怎么心向人家。”不但如此，资本家还编造了不少暗码和黑话，如，有个时期暗码是：“竞争商界利，交易手中和；新太平。”前面十个字表示一至十个号码，后面三字表示元、角、分。黑话是“跳不跳”（意思是卖不卖）？当顾客买东西讲价钱时，他们就看人行事，互相会意交换眼色，彼此搭配暗码，说黑话，从中捣鬼。每隔一个时期更换一次暗码和黑话。他们就是用这些暗码黑话勾结起来欺骗顾客。

“三年寒窗苦，挣下七块五”。我学了三年徒，资本家答应给三十块钱，可是除去平素借款，七折八扣只剩下七块

五毛錢。当时买一双布鞋就得一块四。想回家看看，连路费也不够。怎么办？只好向伙计们七凑八凑，才算回了一趟家。

一声春雷巨响，太原解放了。我和成千上万的店员一样，跳出苦海，获得新生，当家作了主人。

每当我想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的时候，就产生了用不完的力量。我每天从早晨上班走进柜台，到晚上下班铃响，始终热情地接待着顾客，耐心地向顾客介绍商品的质量、特点，并帮助他们挑选。我常想：今天，我们是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服务，是为劳动人民挑选商品。就应该待顾客如亲人，热心诚意，亲切和气，象对待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一样，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今年四月的一天傍晚，职工们已经下班了，我正和青年业务员王明整理商品，忽然有两位顾客来到门市部，说正太街饭店新设了一个冷食部，第二天就要开始营业，急需一批口杯、瓷盘、水壶等用具。为了不耽误他们营业，第二天一早，我就拉上平车给他们送货上门了。有一次，公共汽车公司派人来买厚玻璃，当时门市部没有，我就告诉顾客说：“你先回去，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过了两天，我便从太原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采购回长期积压的二十箱厚玻璃，亲自给公共汽车公司送上门去。同志们夸我“老当益壮”，可我感到，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领导要我带徒弟，不由地联想起许多往事。在旧社会当店员，受尽反动统治阶级的百般压迫，根本没有社会地位，生活没有保障，不是生活逼迫，哪有人愿当小徒弟。可是在

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情况就不一样了：商业职工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越过越好，并且处处受人尊敬。国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一批又一批地培养商业战线上的接班人。我想自己不仅应该做好岗位工作，而且要为本行业培养更多、更好的接班人。

从公私合营以来，经我手培养的已有十九名是优秀售货员了。

现在我的家庭也是美满幸福的：大儿子和儿媳当工人，二儿子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农业生产，老母亲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老伴在家料理家务，并在生产大队劳动。全家七口人，每月收入一百二十多元，生活过得很好，有近十床被子，三辆自行车，一架收音机。我常对孩子们说：绝不能忘记过去的悲惨生活，忘了过去就是忘本。今天的幸福，全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的结果。我们要很好地劳动、工作、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做得还很不够，但党和同志们却给了我不少荣誉，解放以来十多次被评为公司、区、市的红旗手，先进生产者。这一切都是党培养的结果。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以来，党先后送我学习过十五、六次，使我的文化水平、业务水平都有了一定提高。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电 明整理）

（邓瑞芳 王怀基插图）

人間地獄變天堂

陽曲縣侯村公社趙莊大隊社員 周道明

我叫周道明，是陽曲縣侯村公社趙莊生產大隊的社員，今年四十二歲。其實我並不是山西人，也不姓周，而姓榮。情況是這樣的：我十二歲時，我們老家遭了一場大旱災，生活逼得過不下去，父母忍痛把我賣到這裡。從此，我就變成了陽曲人。每當提起這件事，我總忍不住要流出眼淚。

家破人亡 流落外鄉

說起來話就長了。我小的時候，家有父母、姐姐，連我共四口人，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全靠租種地主的土地過活。好年頭，還能勉強過得去，遇到歉收年，不是向地主借債，就是討吃要飯。在舊社會里窮人的日子真難過呀！記得我十歲時，我家住在地主的一間小草棚里，夏天還好對付，一到冬天就只好滾蛋蛋。一年四季都靠那一身補了又補的破衣裳，棉換單，單改棉根本沒有替換的。一個破被子全家人蓋了十幾年。一家四口人二百斤糧食要吃十個月，每人每天還不到二兩糧，每頓飯只好是一鍋菜湯、兩把糠面拌成糊糊，

成年累月吃不到一顿纯粮饭。

我十二岁那年，家乡遭了大旱灾，秋后，我家把全部收下的粮食给了地主，才够租子的一半。万恶的地主，从来不顾穷人的死活，在这灾荒的情况下，更是一日三次上门催租逼债。父亲再三恳求：“缓几个月吧！”黑心的地主，两只狗眼一瞪，拍胸跺脚地说：“一天不饶，赶快交租。”我父亲被逼得无奈，只好当天夜里，引着母亲，拉着我和姐姐，离开了可爱但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故乡（呼和浩特附近的一个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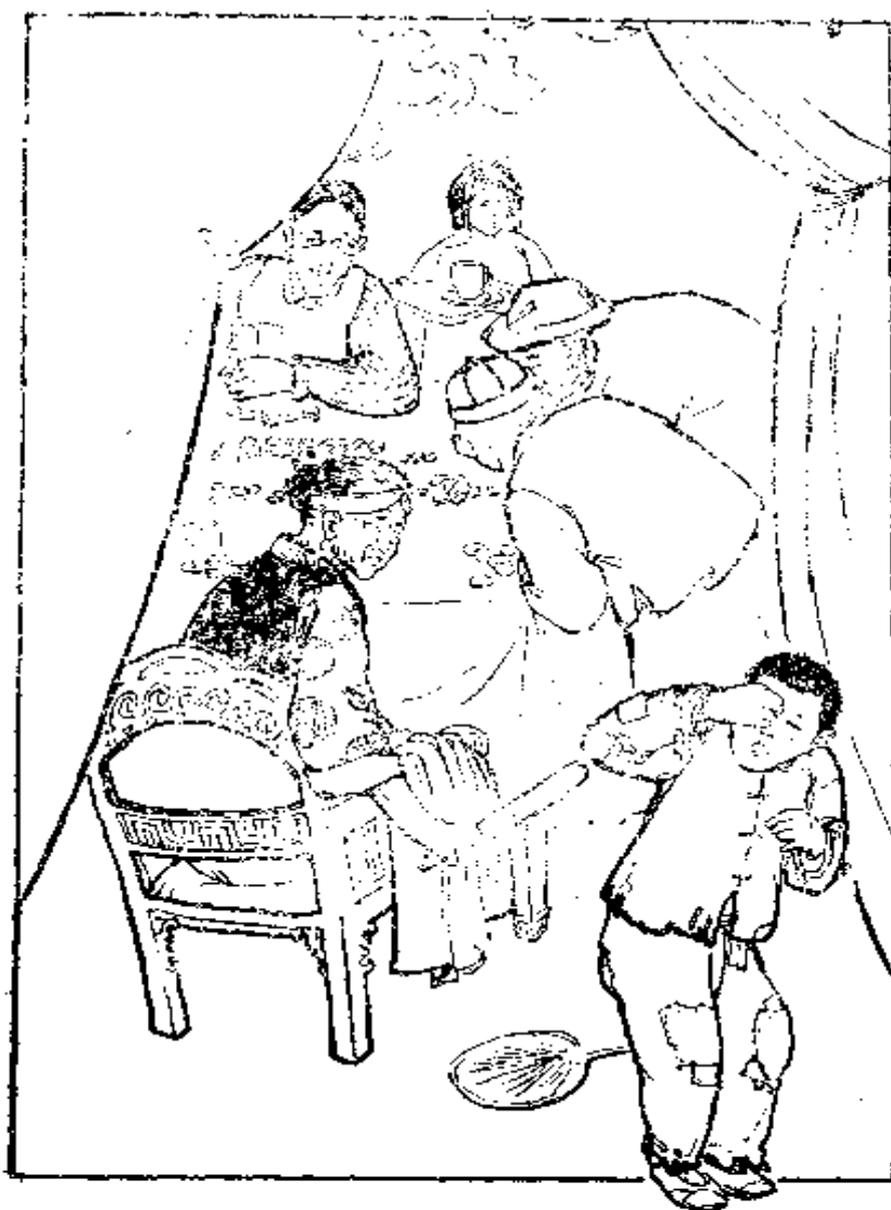
村)。一路上讨吃要饭，总算逃到了归化城（呼和浩特）。城里又怎么样呢？天下乌鸦一般黑，依然没有穷人的活路。这里有的是大商店、大买卖家，可是一口饭也讨不出来，遇上阔少爷张张口，有时还要骂你半天。天黑了，就睡在马路

旁过夜，饱受风寒侵袭不用说，还常常被警察赶来赶去，受人的气，挨人的打。

天气冷了，有钱人都穿起了皮袄棉衣，我们却浑身上下只穿一身破衣服，连羞耻都遮不住，又冻又饿。实在活不下去了，父母商量，要把姐姐给人去当童养媳，将我卖掉换些钱，父亲的话还未落，我和姐姐就倒伏在妈妈的怀里，痛哭起来，于是全家人哭成了一团。临走的那天，人贩子不让我与母亲见面，逼着父亲把我哄出来，推到车上就拉走了。出卖我换下了十三块钱。第二天，我父亲走到一家地主门前讨饭，无意中露出了他身上的钱，地主狗眼一瞅，顿时起了歹心，便假惺惺表示愿发慈悲，暗拿些毒药放进饭里，把这饭盛给我父亲。我父亲接过来，一口气吃完了，还没走回家，药性大发，肚子突然剧痛起来，立即昏倒在地，七孔流血就死了。地主趁势掏走了我父亲怀中的十三块钱。我可怜的妈妈，为了求生，就给邻村的一家地主当了佣人。从此，我的一家就这样，四离五散。

挨打受气 牛马不如

人贩子把我带到山西后，以三十元的身价把我卖到阳曲县赵庄村给地主李泽相家当了奴隶——瘦小子，整天挨打受气，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李家地主有钱有势，豪华的房院，占了整个村子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非常奢侈，僱有许多瘦小子和瘦尼子侍候地主李泽相的母亲，这老家伙就跟黄世



仁的母亲一样恶毒。她每天喝酒吃肉，逛花园，抽大烟，打牌九。喝水、吸烟都得我们去侍候，早晚提盆倒尿也是我们的事。到伏天，还要给她摇扇子，从早到晚日日如此，有时鸡叫天明都不叫我们走开。人家要甚东西，马上就得到手，她身边经常带

有木棍、皮鞭、手板等刑具，行动稍为慢一点，皮鞭马上就会落到你身上。有一天晚上，她要喝茶，我听错了，就端去开水，她二话没说，把我推倒在地，用皮鞭抽、棍子敲，把我毒打了一顿，真是有苦难言。地主李泽相的父亲李辉，更是无恶不作，他看上了丫环桂香，经常想法聊逗人家。一天，趁桂香给他打扫房间的机会，进行了调戏，

后被他老婆发现，反而把桂香连踢带打赶出他家。我白天干杂活，晚上侍候老杂种们，把我闹得整天瞌睡打盹，昏昏沉沉。三、五天还能顶得住，可是日子一久就受不了，我的伙伴大部分是阳曲人，因受不了这份罪，陆续跑掉了一多半。而我也并不是傻瓜，他越刻薄我，我就越不好好干，轻活计不吭声，重活儿就装病或采取磨的办法，有时老杂种们睡了觉，我就趁机歇歇。有一天，累得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到后院草房里，狠狠地睡了一觉，不料被地主李泽相发现了，硬逼着佣人们把我痛打了一顿后，就赶我到马房里去喂牲口。不久又把我卖给了一个姓周的作继子。

奔走三省 走投无门

周家是个中等户，全家四口人，种得有三十多亩地。我初去时他们还假仁假义地待我不错，可是日子稍为久一点，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继母开始虐待我了，经常指鸡骂狗，并指使她闺女打我，想尽一切办法撵我走。继父怕我和家里闹出乱子，便叫我给邻村人家放牛羊、打短工。我十八岁那年，又托邻村人雷镇海，带我到陕西、河南等地当临时工，沿家串户，连续干了四年，分文也未剩下。回到家来还是没法生活，就给地主陈维红扛了长工，管饭没工钱，又白白地干了三年。出来后不久，又给地主张世祥去扛长工。这狗日的是个更恶毒的老财迷，他把我当牛马来使用，每天是上工天不明，下工满天星。吃的是发了霉的粮食，还常常填不饱

肚皮。他们住的是阳光正房，叫我住在靠近牲口的一间草房里，潮湿不堪，臭气难闻。日久天长，我便得了伤寒病。俗话说：朝廷还不使唤病人哩，可是地主老财却不管这一套，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得给他干活。五黄六月大热天，不叫歇晌，不是叫干这，就是叫干那，有时还要挨打。咱辛辛苦苦地干，本想望能端个长久饭碗，没想到还不到冬天，地主就把我辞退了。出来以后就打短工，一直干了二、三年，好不容易才积存下了二百余元。地主陈维红，看我还能受，便托人把我二次叫回他家扛长工，答应每天给一元工钱。我考虑也可以，于是又回到了陈家，到年终，结余下了百十块钱。我想提出来存入银行，老财迷猜透了我的心思，劝我连过去攒下的钱一块儿存到他家，并假意许我将来帮我买一头毛驴。咱这实心人，二话没说，就照他的意见办了。半个月之后，眼看伪币更毛起来了，我要求提出来买东西。而他利用我的钱搞投机倒把活动，一直不理我的碴儿，到最后见我催得不行了，他才给我拿出三百七十块鬼票子。拿上这些鬼票子，我又恨又气，本想立刻进城和他打官司，但有些穷哥们劝我说：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进不来。在这暗天无日的社会里，哪有穷人讲话的地方。当时，我虽然难过，但找不着个反抗办法。不过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穷人受苦的根源，不是别的，就是地主、老财们的剥削和压迫。于是我一狠心就不干了。过了不久，听说太原解放了。我千方百计地筹了点路费，回到了阳曲。

翻身不忘共产党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斗倒了地主，分了房子和土地，不久又娶了老婆，建立了家庭。这是我在旧社会二十多年没有实现的愿望，现在实现了。现在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日子过得很舒展。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光景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不愁吃，不愁穿，住的好房子，盖的新被子。生产队对我很关心，看我身体不好，就给我分配一些轻便的活干。今年春天，我得了伤寒病，队干部和社员都来看我，大队还预借给我五十余元，帮助我治好了病。这在旧社会，还不知落个什么下场。

还有一件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党和政府帮助我找到了失散二十多年的母亲和姐姐，她们同我一样，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也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经常来来往往，书信不断，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旧社会把我弄得家破人亡，四离五散，新社会使我兴家立业，生活有了保障。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讨吃要饭、给人当牛做马、受人剥削和压迫的人，今天会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救了我。我懂得了穷人所以受苦，并不是命该如此，而是受了官仔、地主、资本家们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

果。党给我的恩情永生永世也忘不了。我坚决听党的话，走集体化道路，为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献身出力。

(守澄整理)

(邓瑞芳 王怀基插图)